

文化不适应视域下晚清中国的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张师伟, 曹 姣

(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中国在近代与西方两极相逢, 遭遇了重重的文化危机, 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态势和走势。晚清时期, 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的形成及其脱困经历有自身的规律及相应的内在机理, 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根源于传统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地发生现代转换, 这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及现代性等方面出现了三重不适应。17 世纪以来, 中西方文化对比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历史性悬殊, 在趋势上呈西升东降之势, 文化先进性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携先进性优势, 强势打破了中国大门, 从而在民族性层面上使传统文化处在藩篱破碎的破防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未能转生出现代性, 国家文化危机的克服缺乏可以依赖的现代力量, 晚清中国深陷国家文化安全困境, 难以自拔。

〔关键词〕晚清中国; 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属性; 历史走势; 内在机理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3. 04. 004

中国在晚清时期处于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中西之争的漩涡中, 遭遇了严重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西方世界进入到了以民主和科学为先进性标准的新时代, 而同时期的中国却仍停留在“三纲五常”的旧时代。晚清中国由于统治集团的闭目塞听与虚骄心态, 错失了“与时俱进”的机会, 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逐渐处在了劣势地位, 不仅在军事、商贸等领域丧失了竞争优势, 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陷入了困顿。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 儒家传统文化虽然曾

一度延缓了西方文化的输入, 但旧文化在抗拒新文化的过程中仍无可挽回地没落了, 而新文化也因严重受阻未能及时地成长起来。鸦片战争后, 科学与民主长期未能进入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 学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一度变得相当困难, 抱定传统儒学价值体系, 拒绝和排斥西学的心态曾长期左右着社会舆情。晚清中国在新旧文化博弈及嬗变中陷入了日趋严重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 它既是国家政治危机的前奏, 也是导致国家政治危机的深层文化因素。

作者简介: 张师伟, 历史学博士,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 曹姣, 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化安全。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换与创新研究”(22XZZ010)的阶段性成果。

一、先进性更迭：世界格局中的中西方文化的地位演变

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也长期保持着国家文化的先进性优势。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列强逐渐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领域的先进性优势,并据此优势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殖民化浪潮。中国在殖民化浪潮中“成为最大的猎取目标”,^[1]世界格局中的文化先进性发生了历史性更迭,文化先进性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方。

(一) 西方世界的崛起及世界的殖民化浪潮

中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较大幅度地影响了双方的生活,但这种交往还不足以根本性地影响彼此的国运。工业革命是中西方国家文化先进性更迭的分水岭。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的机器化大生产使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在生产部门结构及社会结构上,与同时代的清王朝形成了鲜明对比。“185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39%,贸易占36%”,^[2]“1851年后,农业劳动力不仅相对数字减少,绝对数字也在减少”,^[3]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跃居世界首位。晚清中国在洋务运动前完全没有机器化大生产,“成千上万胼手胝足、转辗沟壑的小农背负着一代代讴歌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或性心理义的士人。”^[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列强在军事领域也实现了深刻变革,“枪炮技术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得热兵器的精确性、杀伤力和作战效率大幅提升,……西方社会利用军事能力争夺海权的范围和能力大幅提高”。^[5]西方列强在生产水平、财富占有及军事力量上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武装侵略、殖民掠夺及文化奴役的坚实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使西方列强获得了政治上的明显先进性,率先迈进了现代国家行列。英国正是借助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顺利

解构了旧的阶级结构,形成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也相继在工业革命后确立起了宪制政体,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优势一旦确立起来,就会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及文化,促进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晚清中国在政治上仍迟滞徘徊在君主专制的老路上,尽管已到穷途末路,但仍在苦苦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晚清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历史仍在旧圈子里徐徐地盘旋而行”。^[6]

工业革命后发达的物质生产、复杂的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发展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先进的政治制度又给科学研究提供了相应保障。现代国家中的科学研究及文化普及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工业革命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首要影响就是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和实验,发现自然界各种物质的运动及其规律,并总结出各门学科(数学、力学、电学、光学等)的系统知识,创造了完整的科学理论和学说”。^[7]自然科学的成就还带动了社会科学的大幅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及政治学都有了跨越性发展,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率先在西方国家确立起来。工业革命同时还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丰富的艺术内容、多样的艺术形式,都饱含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体现着文化的先进性,培育了现代公民群体。

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后全面崛起,获得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先进性明显优势,具备了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武装侵略及文化奴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充分条件,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殖民化浪潮。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实际上已经无力抵御西方列强掀起的殖民化浪潮。面对严峻的外来挑战,晚清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岌岌可危。

(二) 晚清中国的前现代特质及儒学价值坚守
鸦片战争前,中国依旧徘徊迟滞在传统阶段,“随着旧王朝行将走向自己的尽头,中国又面

临着一个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局面。”^[8] 相比于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后步入机器大生产阶段,晚清中国的生产力还维持在较低水平,尽管其中也不乏有大的商贸集团,但商贸集团的存在及发展既没有体现和促进新生产力发展,也没有改变社会主要的生产关系,农工相辅的小农经济保持着自给自足的本性。当小农经济在历史周期律与外来经济冲击下陷入困顿时,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泥淖。1852年至1863年国库平均收入仅为道光前期常年的70.4%,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折合白银1960万两,军费估计达到4000万两,两次鸦片战争财政支出之和超过一亿两,清政府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从贸易上看,因鸦片和外国商品倾销导致的贸易出超不断严重,仅1846年中国就出现了1300万元的贸易逆差。^[9] 晚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采取的措施,诸如推广捐例、发行纸币与大钱、借外债、增加赋税等,更是反过来加重了社会的危机。

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朝代更迭,却始终未曾改变君主专制的本质,清政府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不仅在政体上仍然坚守着君主专制的体制,奉行着君臣大义的基本原则,推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各自的职责设定正如韩愈所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10] 尽管晚清社会已呈现出政治黑暗、财政困难、军备废弛的衰败景象,出现了诸多批评性的政治言论,但在政治上却并没有表现出告别传统的趋势。龚自珍在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封建专制制度时也仍未能超越传统思想的范围,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依然是《孟子》的民本思想。^[11]

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结果,也是儒家传统价值观长期塑造的结果。当西方国家通过启蒙运动催生了普遍的个性觉醒,使科学与民主精神广泛普及时,晚清中国却依旧处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自觉守护着“纲常名教”,坚信“立国之道,尚礼

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12] 极力反对学习西方“奇技淫巧”。即便是如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地要行孔孟朱程之学,不只口讲而已”。^[13] 直到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士绅仍然反对在政治价值上作出任何倾向于自由、平等、民权等的改变。尽管“洋务派”及“维新派”中的部分进步人士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但他们的意识却始终无法摆脱“三纲五常”的价值束缚。比如曾国藩尽管主张革新,接受部分西方文化,但他也是守旧的,强调恢复传统美德。练兵时注重精神教育,而这一精神的核心就是儒家伦理纲常,乞之以忠信为甲冑,以礼义为干橹。^[14] 尽管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给晚清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变化,但俗与礼相连,在一个久以礼教立国的社会里,饮食、衣冠、住行都积淀着伦理文化特有的意义。^[15] 晚清中国在儒家价值上的坚守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普遍性,现代价值观念的传入和普及面对的阻力可想而知。

(三)文化先进性的西升东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传统时代长期具有文化上的先进性优势,但鸦片战争之后,却遭遇到了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化,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转变在根本上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先进性西升东降的历史结果。西方文化所以变得先进起来,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它的先进性更明显地和科学、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时代精神密不可分。西方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突破,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给全人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境界,探索了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新路径。虽然有的学者致力于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因素,但仅仅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诸要素显然不能产生从传统到现代所需要的科学理论突破及其制度的建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提供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些关键性必要条件,而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却以文化传

播的方式打开了从传统迈入现代的道路。

西方现代国家在文化上变得先进起来,就其自身而言,无疑体现了文明的进步,打碎了封建枷锁,实现了普遍自由,追求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个人的自由平等受着财产的限制,但相对于中世纪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尽管它是一个先进的存在,但在面对人类社会其他群体时,西方国家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残酷性。它所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殖民化浪潮,不仅将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区域变成了它的殖民地,而且还在殖民全球的过程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殖民掠夺、种族灭绝等,书写了一部殖民地人民的血泪史。中国在经历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的过程中也同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人反抗西方列强的过程虽然悲壮,但却仍然不得不面对悲剧性的尴尬结果。这种悲壮和尴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先进性西升东降对中国的一种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尽管缺乏现代国家在文化上的核心要义,但作为一种传承了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先进性西升东降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已经不可避免,但由于这个转型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而并不体现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规律及其所决定的发展趋势仍然在历史进程中惯性地进行着,它与由外部所决定的中国历史发展趋势产生了根本性冲突。晚清中国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及苦难皆与此密不可分,它在历史进程中遭遇国家文化安全危机,也就由此而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必然性根基于晚清中国遭遇的独特历史矛盾,即世界格局下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矛盾,决定了中国从传统转型到现代的历史性曲折难以避免。晚清中国遭遇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正是这种历史性曲折的阶段性表现。

二、民族性势弱:中国文化在列国文化竞争中生存艰难

西方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强化了文化的国家属性,国家间的竞争包含着文化竞争,文化竞争也受国家间竞争的决定性影响,并反过来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尽管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都由曲线前进,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只看历史上各时期之治乱兴衰,便可见其文化进退升沉之大概”。^[16]但在文化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国家无疑会削弱国家对文化的保护功能,并由此加重文化危机的程度。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国力渐趋羸弱,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既无力维护旧文化,也未能建构起新文化,中国文化在列国文化竞争的背景下因失去国家守护而处境尴尬,处于明显弱势。

(一)西方列强的实力优势及其对华强势文化输入

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因其先进性而具有强势地位,在列强的保护和驱动下,世界文化潮流整体上由西方文化主导,“帝国主义何其雄,欧风美雨驰而东”。不同文明的国家都在西方列强殖民化的浪潮中丧失了国家的独立性,其传统文化也因失去了国家藩篱的护卫而逐渐陷入危险境地。即使各国在殖民化浪潮中积极维护其传统文化,也不足以抵御西方文化背后雄厚的物质力量。清政府曾长期严格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但最终还是无法抵御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

清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曾长期在心理上保持文化优越感,秉持着“尊中华而贱四夷”的观念。19世纪以前,外国人对于清政府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17]伴随着中西方贸易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开始寻求与清政府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英国作为西方率先走上工业革命的国家,曾多次试图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关系,但清政府对世界上已经发

生的大变革还缺乏起码认识,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承认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平等地位。尽管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已经在实践中展现了出来,但在它来到中国之初,仍被清政府挡在了国门之外。不过西方列强还是凭借着坚船利炮轰开了晚清的国门,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创造了充分条件。西方来华传教士是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入的急先锋,对晚清时期的文学、科技、艺术、教育、新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统计,仅美国和加拿大志愿来华传教的学生人数在1914年已有1739人之多”。^[18]这些虽然有利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了解,在中国从传统转换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客观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毋庸讳言,它们的传入仍依赖于列强的护佑。

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刺激了中国先进分子,迫使他们为改变国家命运而自觉学习西学。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始于洋务运动。晚清政府分别于1872年、1873年、1874年和1875年分批次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试图以熟悉西学的人才守护晚清中国的国家藩篱,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继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后,从1877年到1897年这20年间,福建船政学堂又先后向英、法派遣了四期85名留学生。据统计,从1896年到1905年,中国留日生多达万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无一例外均有留学经历。”^[19]近代中国留学生从最早开始学习工程、数学、各类器械驾驶和制造,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及各类社会科学,其中不少人学成归国后成了领导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二)传统儒学的危机应对乏力及其逐步解体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的政治荡涤,但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上却相互结合并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儒学在修复和巩固超稳定结构社会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自汉代确立正统地位以来,显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思想流派”,其在

统治权力的支撑下,成为封建社会数千年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为封建统治提供正当性的制度化存在。^[20]清王朝及儒学都已经高度成熟,双方在互动中共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运转,不论是变革社会、变革政治,还是变革文化,都会面临着一种协同性的阻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对的内外形势已经异常急迫,社会及政治变革已势在必行,但却长期面对着来自传统儒学的极力抗拒,其因价值守旧而在应对内外危机上表现出来的乏力又在实践中加重了晚清中国的危机。

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与西学的接触中率先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危机。这一方面是因为士大夫群体在价值观上的“尊中华而贱四夷”意识,使得他们在文化上保持着高度的自信与自尊,他们对一切挑衅儒家价值观的文化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与儒家的根本不同,自清朝初年就引起了士大夫群体中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并为避免儒家价值的文化危机而采取了排斥西学的态度,统治者在面对西学中的宗教在价值观上表现出与儒家的敌对之后,因担心文化危机连带性地危及政治权威,而对西学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当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凭借坚船利炮强行进入中国之后,士大夫群体中排斥西学以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心理再次被激活。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保护下的西方文化输入又过于强势,在实践中遭遇中外文化冲突时,西方文化总是依托武力恐吓和条约特权而居于强势,士大夫群体中“以夷变夏”的忧虑时刻警醒他们注意儒家价值观因西学输入而遭遇的文化安全危机。

虽然士大夫群体中保持着浓郁的文化危机意识,但儒学因其内容缺陷而在整体上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清王朝面对内外紧急形势的应变还得依赖于其不得不接受的西学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就只能是渐趋形态意义上的解体。科举制度“作为儒家制度化的核心和枢纽”,^[21]它的废除既标志着儒家制度化的解体,也标志着儒家在形态意义上的总解体。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就

来自于儒家,其安全与否也在根本上取决于儒学的形态是否完整。当儒学的完整形态在晚清渐趋解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安全问题就日益明显地摆放在了士人的面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清王朝也不得不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破防后的政治覆灭结果。

(三)晚清中国文化的民族藩篱破碎及民族性危机

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轰开了晚清中国的大门,也击碎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藩篱。这一方面固然是指儒家文化的整体性架构逐渐解体,而陷晚清中国于国家文化不设防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文化民族藩篱的破碎也指在学习西方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新文化,倾向于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按照西方文化的模板改造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文化的民族性藩篱没有自觉建构起来。

伴随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民族藩篱渐趋破碎,晚清社会的文化环境呈现出了殖民地化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是西学传播不可遏制,西学在国内逐渐流行。殖民地化程度最深的租界,不仅是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同时也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根据地”,为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透提供了便捷,西学最终渗入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西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已然不再受文化民族藩篱的内容过滤,在救亡的驱动下,仿效和移植西方政治,按照西方文化的模板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化,成了一个颇有号召力的主张。在晚清中国的文化图谱中,面对西学东渐的大势所趋,文化上的西化渐成主流,儒家传统文化终至式微。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数千年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与政治权力、制度设计和真理之间的互相配合,^[22]构成了完整的涉及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儒学体系,它是传统中国进行国民性塑造等的核心内容,关系着政治秩序的维系和政治权威的巩固。传统儒学在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式微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和影响力,并最

终没落在了时代剧变的尘埃里。儒学体系的瓦解客观上导致了晚清中国在国家文化内容上的民族性藩篱之“破”。它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两极相逢时,逐渐因其藩篱破碎而处于弱势,陷国家于文化不安全的险境;另一方面民族性藩篱的破碎也使得西学内容得以广泛传播,但中国却一度因此失去了在西方文化输入环节上的必要选择性,多种思潮涌入中国,彼此激烈争鸣,又难于辨明是非,加剧了新文化发展中的选择困境。

三、现代性不足:公民内涵转化危机与权利意识缺失

自汉代以来,中国人在思想上长期桎梏于儒家的伦理纲常,民众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建立在“不平等”的价值基础上。中国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公民”概念,但其内涵与现代国家中的“公民”相去甚远。西方列强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及相应权利的基础上,国家保障公民的权利。西方列强在彼此竞争的过程中无不以民族精神武装其公民,而公民也以民族精神自励,面向国家输出爱国主义的行为。清王朝在面临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时因公民身份及权利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应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人力基础。

(一)中国传统纲常论及现代公民身份认同的伦理包袱

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世界,通过资产阶级宪制政体的确立与思想启蒙,开启了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公民政治时代,“公民”的概念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权利成了其本质规定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体在儒家纲常名教的潜移默化下,既没有公民身份的平等意识,也没有公民身份的权利意识,而只是谨守“三纲五常”的子民。社会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认同完全由“臣民”文化主导,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核,谨守“思不越位”的古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既要求男有分,女有归,各守其分,各安其位,也要求

维护永恒的三纲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戊戌变法时期,晚清统治者中的顽固派,在纲常名教观念的深刻影响下极力反对和阻止各种变法言论与行为,用“祖宗训诫”反对平等,将君权与民权对立起来。晚清中国在遭遇深层文化危机的背景下,臣民意识仍然深植于国民的思维乃至行为之中,公民意识的普及依然步履维艰。顽固派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原则,将变法言论视为邪说,诋毁其为“影附西方,潜移圣教”,强调“圣人之纲常不可攻也”,甚至认为,“三纲”一旦溃决,中华将不复为中华。这种固守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必定会阻遏“公民意识”的普及,而“公民意识”的缺乏又在客观上加重了国家文化危机的程度。虽然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三代以后,中国致弱的根源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提出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但社会的主流话语却仍掌握在那些传统卫道士手中,强调“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23]

晚清中国的国民在儒家传统“三纲五常”思想的长期影响下,自觉接受了“教化”,被培养成了君权的附庸和工具,缺少了必要的个人独立性与自主性,表现出了较多的依附性,甚至还在国民性中包含了较多的奴性。这种国民性曾经帮助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虽然朝代不断更迭,却始终走不出君主专制的窠臼。但在近代社会与西方两极相逢时,这种国民性就严重阻碍了西方民主进步思潮在中国社会的传播,限制了公民身份的普遍养成,不利于公民形成应有的权利自觉。统治者中的守旧势力即便在学习西学之后仍坚定守护着“三纲五常”,强调其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亘古不变”,由此足见“三纲五常”对于旧秩序、旧权威的支撑及维护作用,其在根本上成了现代公民身份认同的沉重伦理包袱。

(二)晚清中国的现代性匮乏与权利意识淡漠

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后快速地成长为现代国家,不论是在现代国家的组织体系及运行的机制体制方面,还是在培养现代公民方面,西方列强无疑都处于领先地位,与此相比较,晚清中国的现代性则明显表现得匮乏。一方面,晚清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的组织体系及运行的机制体制方面还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既缺乏现代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及教育等组织体系,也缺乏现代社会组织体系运行的必要民主基础和法治保障;另一方面,晚清中国的社会公众尚未经过现代价值观念的启蒙,还被旧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及政治权威等牢固束缚着,权利意识还非常淡漠。这既是因为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传统还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万事都寄希望于圣贤,不仅最高统治者屡屡表示出“以一人治天下”的使命感,而且臣民也将国家事务推给了“肉食者谋之”;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上对“人欲之私”抱着敌对的态度,“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这也使得在价值上普遍肯定个体的权利还面临着伦理上的极大障碍。

晚清中国现代性的匮乏还表现在政治参与的冷漠上。尽管立宪派对选举有着高度热情,但他们还是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遭遇了较大范围的冷遇。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公民积极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在西方国家屡有出现,且日趋激烈,最终获得了普遍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晚清中国因为现代性的不足,缺乏政治参与的意识,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淡漠,所以当国家面对着外来侵略与威胁时,就只有统治者出来应对,且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根本目的。统治者在应对外来侵略和威胁时,往往为保全自己的政治统治及一己之私,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误国家者,在一‘私’字”。晚清统治者在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以自己的利害得失来决定现代国家的宪制结构,拒绝让公众在现代国家中扮演主人翁角色和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导致晚清中

国在转型为现代国家过程中土崩瓦解。

晚清中国的公众未曾经历过系统完善的现代启蒙教育,即使是其中的先进分子也不例外,少数人接受的现代启蒙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较为强烈的救亡图存的诉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先进分子未能充分地认识到西学的先进性,仅仅以是否能有效进行救亡图存为标准去判断西学的价值,从而决定其对西学的态度。西学中的民主、政党、法治、责任内阁、议会制、分权制衡等在清末的立宪派中有了较好的传播,但权利的相关内容却并不充分。权利意识淡漠不仅出现在清末的选民行为中,而且也出现在立宪派精英的政治行为中,前者显示公众普遍存在权利意识不足的情况,后者则显示立宪派精英主要关注现代国家体制中的权力安排,而不是公民政治权利的普遍保障。晚清中国普遍存在的权利意识不足,既妨碍了公民在新文化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启蒙,也不利于公民的主动作为与积极担当,从而不利于现代国家建构获得公民的普遍支持,并由此阻碍了传统国家在转型为现代国家过程中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权利保障,最终阻碍了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所依赖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三)晚清中国现代性成长困难的传统政治文化制约

晚清中国在遭遇西学之初具有较高的文化自信,面对西学东渐,虽然并不欢迎,也没有完全拒绝,但毕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文化不安全焦虑。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面对中外交往的新形势,拒绝闭目塞听,主动“开眼看世界”,魏源则更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他们看到了西学之长,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所支撑的国家机器仍然有相当自信。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既在朝野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出现了能较为客观看待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他们在看到西学之长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从而产生了较明显的文化安全焦虑。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可以理解为缘外部变故而发生的严重冲击,造成内部‘文化的心态’失衡,引起了人们

普遍的心理焦虑、行为失范,从而陷入危机的状态”。^[24]面对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19世纪60年代的士大夫群体发生了分裂。有的人在策略及行为选择上倾向于排外,以此来抵御外部环境带来的文化危机,保障晚清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有的人在策略及行为选择上则倾向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之长技”来护卫国家文化安全。两者虽然在策略及行为选择上有明显不同,但其维护传统儒家价值体系的立场是共同的,维护和巩固儒家传统文化安全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晚清顽固派坚守着夷夏大防,试图以闭目塞听来实现国家文化的安全。虽然他们的做法颇有点“掩耳盗铃”,但其坚定维护儒家价值的立场却使儒家文化站到了现代性成长的对立面。洋务派尽管倾向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也以不违反“三纲五常”为前提,即洋务派也是非常坚定地站在儒家价值立场上的,竭力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安全。“三纲五常”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推崇和维护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念,既是维护传统统治秩序和规范民众行为的重要道德原则,也是儒家文化内容的基石,其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必定与相应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及运行机制体制等密不可分。这就意味着儒家传统文化安全在政治上的对应物就是清王朝的政治安全,而政治安全又依赖于文化安全。清王朝从维系政治安全的初衷出发,必定会积极地维系“三纲五常”等儒家传统文化的安全,而士大夫从维护“三纲五常”儒家传统文化安全的动机出发,也会积极地维护清王朝的政治安全。两者在内容及机制上高度粘合到了一起,政治的力量及文化的力量共同把儒家传统文化推到了现代性成长的对立面。

晚清中国的精英都着力于维护儒家传统文化,并以儒家传统文化来抵御世界格局大变动带来的国家文化安全风险。虽然鸦片战争后现代化浪潮以不可阻遏之势席卷而来,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萌生及发展却要求必须要突破儒家传统文化的理论束缚,或者是现代性因素以某种方

式在儒家文化空间中获得存在的正当理由,或者是在文化空间上彻底解体了儒家文化的整体架构,否则现代性因素就不能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因素首先是零星地出现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空间中,而它获取儒家文化承认的路径则主要是在中西方文化间进行求同存异的努力。一方面,这种努力要通过概念解读和理论解释来予以贯彻落实,比如徐继畲以“三代之治”的概念理解和解读美国共和,中美之间在政治理想上的共同点通过概念解读和理论解释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并因此开启了共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另一方面,这种努力还得益于理论家基于实践的反思,在严峻的形势和惨痛的教训之下,以往被儒家传统文化明确排斥的现代性因素也获得了儒家传统文化的肯定,得以在晚清中国立足,比如洋务派曾拒绝的学习西方政治在清末新政的诏令中就得到了积极评价。

然而,晚清中国的儒家文化仍然具有完整的理论形态,在概念、命题及理论逻辑上具有较高的严谨性。这就决定了现代性因素要通过求同存异获得必要的存在空间绝非易事。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晚清国家文化安全的过滤网,它实际上主要发挥着过滤现代性因素的作用。

晚清中国虽然注定要遭遇国家文化安全危机,但危机的大小因统治精英及儒学精英的不同应对而有所不同。如果晚清统治者及儒学精英能够具有宽阔的胸襟、开放的视域,能及时对儒学理论与现代性因素进行嫁接和融通,那么晚清中国遭遇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就会轻得多。事实上,清王朝统治者及儒学精英在应对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儒家价值体系的保守性,并以保守的儒家价值与文化对现代性因素进行纵深梯次防御。因为防御体系的残破程度取决于现代性因素的冲击量,所以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落足就得经历一个渐进性的漫长过程,并由此而不得不长期面临现代性不足的窘境。现代性长期不足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危机,使得晚清中国深陷国家文化安全困境,难

以自拔,终致于政权更迭。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在世界各国都被卷入到现代化潮流中的19世纪,却因中国传统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等方面,与世界历史潮流的不适应和不契合,遭遇了严重的文化安全危机。世界历史的潮流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就是全球一体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因为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日益凸显,成了世界潮流的领导者。晚清中国传统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等的不适应,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不适应。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几乎达到了集大成的总结阶段,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成就,但它在内容上却与17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历史的现代化潮流不适应,不仅它的内部没有发展出现代化要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而且也没有发展起能够顺利承接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文化要素,甚至也没有给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引入提供有利的文化氛围。晚清中国传统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等方面与世界历史现代化潮流不契合,则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体系上对科学和民主具有较强的排斥性,一方面是西方先进的科学长期在士大夫群体中遭受抵制,被看作是“奇技淫巧”而不肯学,另一方面是西方民主思想因与传统儒学在价值观念上的严重对立而在实践中遭遇了传播困境。晚清中国传统文化所固守的知识体系及价值观念与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趋势不相契合以及在文化上与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不适应,从而在根本上导致它在文化先进性、民族性及现代性上出现了相对于世界潮流的滞后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它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回应就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被动性。晚清中国遭遇到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从表面上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列强碾压成了碎片,但从深层看,晚清中国的文化安全危机在根源上却是产生于它未能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及时实现充分的现代性转化。所以晚清中国的文化安全危机在本质上就只能是一个现代性

不足的危机。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体系包含着—个本体论域,即国家及其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方式以及实践意义和价值”,^[25]所以晚清时期,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节奏,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产生出突破的现实力量,即国家及其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方式以及实践意义和价值等,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仍然处在现代性严重不足的状态中。晚清中国的传统政治实践及文化系统已经处在不断解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的对接不顺畅必定会导致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日益严峻,并最终导致清王朝国家文化安全的总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政治安全与国家政治文化安全之间具有必然性的相关联系。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可以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必要的政治庇护和发展保障,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列国竞争也包含了文化的竞争,国家政治安全对文化安全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安全又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文化安全不能有效维护,必定会在政治安全上产生出相应的危险结果。晚清中国在国家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的互动性上陷入了不利的循环,列强不断削弱它的国家政治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的削弱又反过来加剧了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危险,两者的反复互动使清王朝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文化破碎,政权解体。

注释:

[1][4][6][8][1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8、2、2、48、205页。

[2][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298页。

[3]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5]丁勇、俞浏垣:《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近代中西方军事能力差距的思考》,《军事历史》2018年第3期。

[7]许永璋、于兆兴:《科学技术与近代西方文明》,《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9]付志宇:《略论晚清财政危机与清政府的经济对策》,《现代财经》2007年第11期。

[10]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11]郑大华:《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1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0页。

[13][14][1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170、46-52、4页。

[16]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18]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19]赵燕玲:《试论近代中国留学生与西学东渐》,《求索》2002年第2期。

[20][21][22]干春松:《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65、1页。

[23]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15页。

[24]郑师渠:《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25]陈义平、王友叶:《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四重维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汪家耀]